Art Research Letters 艺术研究快报, 2026, 15(4), 590-596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rl
https://doi.org/10.12677/arl.2026.154079

湖南醴陵狮形山象尊研究：器物特征、文化交流与功能意涵

谢璐瑶

西安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

收稿日期：2026年10月5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27日；发布日期：2026年11月11日

摘　要

湖南省博物馆藏的醴陵狮形山象尊作为商周青铜文化的杰出代表，以其独特的艺术造型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研究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重要实物资料。本文将从器物本体特征、南北文化交流以及功能意涵三个方面，对这一珍贵文物进行深入探讨。通过对象尊形制、纹饰、铸造工艺的细致分析，揭示其背后蕴含的南北文化交融现象。结合商周时期“制器尚象”的礼制传统，阐释象尊作为实用酒器的使用功能，在宗教祭祀中承担沟通人神与祖先的媒介功能，以及作为权力与地位象征的多重意义。

关键词

醴陵狮形山象尊，器物特征，文化交流，功能意涵

Study of the Elephant-Shaped Zun from Shixing Mountain in Liling, Hunan: Object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Exchange, and Functional Implications

Luyao Xie

School of Art Humanities, Xi’an Academy of Fine Arts, Xi’an Shaanxi

Received: October 5, 2026; accepted: October 27, 2026; published: November 11, 2026

Abstract

The elephant-shaped zun from Shixing Mountain in Liling, housed in the Hunan Museum, is an

文章引用: 谢璐瑶. 湖南醴陵狮形山象尊研究: 器物特征、文化交流与功能意涵[J]. 艺术研究快报, 2026, 15(4): 590-596. DOI: 10.12677/arl.2026.154079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of Shang and Zhou bronze culture. With its unique artistic form and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s, it serves as important physical material for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bronze civilization.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depth discussion of this precious artifact from three aspects: the object's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North-South cultural exchange, and functional implications. Through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zun's form, decoration, and casting techniques, it reveals the phenomenon of North-South cultural integration embedded within it.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ritual tradition of "making vessels in imitation of images" (zhi qi shang xiang) during the Shang and Zhou periods, it explains the multiple meanings of the elephant-shaped zun: its utilitarian function as a wine vessel, its role as a medium for communication between humans, gods, and ancestors in religious sacrifices, and its significance as a symbol of power and status.

Keywords

Elephant-Shaped Zun from Shixing Mountain in Liling, Object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Exchange, Functional Implication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1975 年，在湖南省醴陵市狮形山一处山坡上，当地农民在植树过程中偶然发现了一件造型奇特的青铜器，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醴陵狮形山象尊。这件珍贵的文物出土时距地表仅约 15 厘米深，虽历经三千余年岁月洗礼，仍保存完好。经考古学家鉴定，这件象尊属于商代晚期至西周初期的遗存，是目前国内罕见的商周青铜象尊实物之一，具有极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1]。

从现存资料来看，已知的商周时期青铜象尊仅有四件，除醴陵狮形山象尊外，其余三件分别收藏于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美国弗瑞尔美术馆和湖北黄冈博物馆。这些象尊分散于不同地域，造型各异，但醴陵象尊以其精湛的铸造工艺和华丽的纹饰组合独树一帜。尤为珍贵的是，醴陵象尊是四件中唯一有明确出土地点的器物，这为研究其文化背景和流传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

目前学界对于湖南醴陵狮形山象尊的研究多停留在造型、纹样等分析上，学者段西洋在《论商代象尊》一文中，对湖南醴陵狮形山象尊的纹样进行深入的探讨[2]，除此之外，不少学者讨论象的渊考问题，学者谭鑫刚所写《湖南省博物馆藏青铜象尊解读》一文中，着重谈论象之渊源与习性。实际上，湖南醴陵狮形山象尊作为商周时期青铜艺术的杰作，不仅反映了当时高超的金属工艺水平，更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既是古人“制器尚象”[3]观念的物化体现，也是南北文化交流的见证，同时还是商周宗教祭祀活动的重要实证。本文试图从器物特征分析、南北文化交流、象征意涵三个方面，深入探析醴陵狮形山象尊蕴含的工艺技术、文化交融和精神信仰。

2. 醴陵狮形山象尊的器物特征分析

醴陵狮形山象尊作为商周青铜艺术的典范之作，其器物特征体现在造型设计、装饰纹样和铸造工艺三个层面，共同构成了这件珍贵文物的独特艺术价值和技术成就。

醴陵狮形山象尊采用了全立体圆雕手法，塑造了一头体态浑厚、神情生动的亚洲象形象(图 1)。与自然界真实大象相比，艺匠们对比例进行了巧妙调整：头部相对硕大，约占全身长度的三分之一；四肢粗短有力，足部分五趾；象鼻异常突出，长度接近全身的一半，呈 S 形上扬后内卷，鼻端开口形成流嘴。

这种艺术化的比例处理，既突出了大象最显著的特征，又赋予器物一种稚拙可爱的审美效果。象背中部开有椭圆形口，原应有盖(已遗失)，据同类器推测盖纽很可能也是一只小象，形成“子母象”的趣味组合。



Figure 1. Elephant-shaped zun from Shixing Mountain in Liling
图 1. 醴陵狮形山象

象尊的动态表现极具匠心。整体采用静态站立姿势，四足均匀受力，给人以稳重安详之感。而卷曲的鼻部又为这一静态造型注入了灵动气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象鼻的曲线处理——从根部到顶端呈现出流畅的 S 形变化，既有向上的昂扬之势，又有向内的回收之力，这种蓄势待发的动态暗示，使得整个器物静中有动，生气盎然。眼睛采用突出的圆瞳设计，直径达 1.5 厘米，中间凹陷为瞳孔，在光影变化下会产生目光流转的视觉效果，进一步增强了象尊的生命力与生动性。

醴陵狮形山象尊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其多层次装饰手法，全器装饰有 20 余种动物形象，形成“三层花”式的纹饰结构，高浮雕的主体纹饰、浅浮雕的辅助纹饰和细密的地纹相互衬托，构成繁而不乱、富丽堂皇的装饰效果。

象鼻作为视觉焦点，其装饰尤为精彩。鼻背正中的扁棱被巧妙地设计为一条蛇形，蛇头向下，眼呈环形突出，占据头部近半区域，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鼻端两侧装饰有高浮雕的虎和鸟纹，虎身健硕，口衔蛇头，尾部长而有力，压在一只鸟身上。鸟体扁平，喙部尖锐呈三角形，仿佛正从象鼻中探出(图 2)。这种虎镇鸟的意象组合充满神秘色彩，可能蕴含着某种特定的宗教寓意。

象身其他部位的纹饰同样精心安排。额头对称的两个圆凸上饰有半浮雕的蟠蛇纹，巨大的椭圆形耳朵表面饰十字形凹纹，耳背则有凤鸟纹装饰。躯干遍布夔龙纹和兽面纹，臀部装饰有完整的饕餮面。四肢则分别饰以不同的兽面纹和夔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动物纹饰的眼睛都采用“臣”字目或圆形凸目设计，瞳孔皆下凹，形成强烈的凝视效果，赋予器物一种超自然的神秘感。

从技术角度看，醴陵狮形山象尊体现了商周时期青铜铸造工艺的最高水平。X 光检测显示，象尊采用当时的多范浑铸法成型，至少使用了 20 块外范(图 3)。具体分范方式颇为巧妙，以象鼻和尾部的扉棱为界，将器体分为左右两大部分，头部自耳边缘向下至象牙单独分范，腹部底部分单独设范，四肢和象鼻内部均有泥芯，铸造完成后被掏空，既节省铜料又减轻重量。



Figure 2. Detail of the elephant-shaped zun from Shixing Mountain in Liling
图 2. 醴陵狮形山象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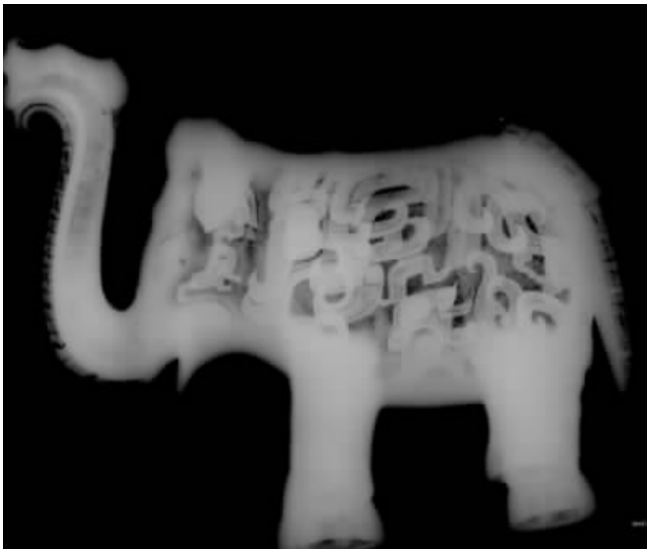


Figure 3. X-ray of the side view of the elephant-shaped zun from Shixing Mountain
图 3. 狮形岭象尊侧面 X 光

象尊的纹饰制作显示出高超的技艺。高浮雕部分如鼻端的虎鸟组合，突起高度达 0.5 厘米，需要在蜡模上精细雕刻而成，而细密的地纹则可能使用了印模技术，以保证纹样的统一性。器表可见多处垫片痕迹，主要用于控制器壁厚度，最薄处仅 2~3 毫米，展示了工匠对铸造过程精准控制的能力。特别令人称奇的是，尽管纹饰繁复，但全器未见明显铸造缺陷，成品率极低的情况下能出现如此完美的作品，足见当时青铜铸造技术之精湛。

从艺术创作角度看，醴陵狮形山象尊体现了商代人“制器尚象”的美学理念。这里的“象”既指大象形象，也指“观物取象”的创作方法。工匠们通过对真实大象的观察，提炼其典型特征，再加以艺术夸

张，创造出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形象。象尊的造型还反映了商代艺术中写实与抽象的巧妙平衡。整体形态把握了大象的基本特征，细节处理却充满想象力，将蛇、虎、鸟等动物融入象体装饰，形成超现实的视觉效果。这种创作手法既满足了礼器的神秘性要求，又展示了工匠的艺术创造力，代表中国古代青铜艺术的文化表征。

醴陵狮形山象尊集写实与夸张、凝重与灵动、简练与繁复于一身，代表了商周时期青铜艺术创作的最高水准。其精湛的工艺和独特的美学风格，不仅反映了当时工匠非凡的创造能力，也体现了商周文明对器物制作的精神追求和审美理想。

3. 从醴陵狮形山象尊看商周时期的南北文化交流

醴陵狮形山象尊不仅是一件艺术珍品，更是研究商周时期南北文化互动的重要物证。通过对其造型渊源、纹饰元素的分析，可以揭示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在青铜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交流与融合。

从动物尊的分布来看，鸟兽形青铜器在南方地区尤为盛行。除醴陵象尊外，湖南地区还出土有四羊方尊、猪尊、牛尊等多件动物造型青铜器，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地域传统。这与中原地区以规整的几何形器为主的青铜器风格形成鲜明对比。象尊采用的全立体圆雕手法，在南方青铜器中较为常见，如湘潭出土的豕尊、三星堆的青铜神兽等都采用了类似的表现方式。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醴陵象尊与法国基美博物馆所藏象尊在额部设计上具有共同特征为都有对称的圆凸结构(图 4)。动物学家指出这是亚洲象特有的额部特征，而非洲象则无此结构。这一细节表明南方工匠对活体大象的观察极为细致，很可能当时长江流域仍有亚洲象栖息。这与《吕氏春秋·古乐篇》中“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4]的记载相吻合，暗示商周之际大象主要分布在南方地区。



Figure 4. Elephant-shaped zun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Musée Guimet
图 4. 吉美博物馆藏象尊

从铸造技术看，醴陵象尊体现的某些工艺特征也与南方传统相关。如器身多处使用的长条形不透空扉棱，与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出土的青铜器装饰手法一脉相承。这种装饰风格在殷墟中期以后的中原青铜器中逐渐减少，却在南方地区长期保留，成为地域特色的标志之一。

尽管造型上具有南方特色，醴陵象尊的纹饰系统却显示出浓厚的中原文化影响。器身遍布的夔龙纹、饕餮纹和云雷地纹，都是典型的中原青铜器装饰母题。特别是臀部完整的兽面纹，与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纹饰几乎如出一辙，表明当时南北两地已经存在广泛的艺术交流。

象尊纹饰中最为突出的“三层花”装饰手法，即地纹、主纹和浮雕相结合，是商代晚期中原青铜器的典型特征。这种繁复的装饰风格最早见于殷墟二期[5]，醴陵象尊将其发挥到极致，说明南方工匠不仅吸收了中原的纹饰题材，还掌握相关的装饰技法。值得注意的是，象尊上所有动物纹样的眼睛都采用“臣”字目或圆形凸目设计，这种强调眼睛表现的手法源自中原“眼目通神”的宗教观念，体现了中原艺术思想在南方的传播。

醴陵狮形山象尊体现的南北交融特征，与商周之际的政治军事活动密切相关。根据甲骨文记载，商王朝曾多次对南方用兵，如“征虎方”、“伐荆楚”等，这些军事行动客观上促进了文化传播。商代晚期，可能由于气候变化或人类活动影响，中原地区大象数量锐减，而南方仍是大象主要栖息地，这使南方工匠在制作象形器时具有实地观察的优势。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醴陵象尊反映的文化交流不是单向的。南方地区丰富的铜矿资源为青铜文明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一些南方特有的器形和纹饰也反向传播到中原地区。这种双向互动最终促进了中国青铜文化的繁荣发展，为后来周代礼乐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醴陵狮形山象尊作为南北文化交流的见证，其价值不仅在于艺术成就，更在于它体现中国早期文明交融的形成过程。通过对这一珍贵文物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三千年前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先民之间已经存在的密切联系，这种联系对我们理解艺术的传播与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4. 醴陵狮形山象尊的功能价值与象征意义

醴陵狮形山象尊作为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其功能与意义远超普通容器，蕴含着丰富的宗教文化内涵。通过对其使用功能、象征意涵的分析，可以深入理解这件珍贵文物在古代社会中的特殊地位。

从器物形制看，醴陵狮形山象尊具有明确的实用功能。背部椭圆形开口为注酒口，已遗失的器盖既可防止酒液挥发，又能保持洁净。中空的象鼻作为流嘴，用于倾倒酒液，设计巧妙合理。这种将艺术造型与实用功能完美结合的特点，正是商周青铜礼器的精髓所在。值得注意的是，象鼻与腹腔相连的通道呈渐缩式设计，这种结构可以控制酒液流速，避免倾泻过快，显示出工匠对力学的朴素认识。

醴陵狮形山象尊不仅具有符合日常生活情境的使用功能，而且象这一动物对于商人的祭祀活动亦无比重要。据《礼记·表记》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6]其中，对于祖宗的祭祀活动最多。有学者统计，迄今所见卜辞中的 37 王，关于祭祀上甲的就有 1100 多条，祭祀成汤的 800 多条，祭祀祖乙的 900 多条，祭祀武丁的 600 多条。在全部卜辞中，确认为祭祀祖先的共 15,000 多条[7]。因此，可以较为确定的是商人对于先祖神的崇拜以及祭祖是祭祀活动中的主要内容。

从考古发现和甲骨卜辞的记载中，可以看到殷商时期将大象作为祭牲来祭祀祖先的情况。在殷墟的考古遗址中发现有动物埋葬坑，在动物埋葬坑中发现有象坑的，殷王陵区就有两座之多。据学者杨宝成考证，大象实则为商人祭祀祖先所用的祭品[8]。现实存在的大象被用以祭祀祖先，以大象作为创作原型的醴陵狮形山象尊亦有可能承载着相似的文化使命。

张光直先生在其《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中这样说：“在商周早期，神话中的动物的功能，是发挥在人的世界与祖先及神的世界沟通之上的。在古代的中国，作为与死去的祖先之沟通的占卜术，是靠动物骨骼的助力而施行的。礼乐铜器在当时显然用于祖先崇拜的仪式，而且与死后去参加祖先的行列的人一起埋葬。因此，这些铜器上铸刻着作为人的世界与祖先及神的世界之沟通的媒介的神话性的动物纹，毋宁说是很不难理解的现象。”[9]可见，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并非纯粹具有审美意义，而是用于沟通人

与神、人与祖先的媒介。象尊存在的夔龙纹、饕餮纹和云雷地纹等动物纹样本身便具有象征意义。张光直先生提出“萨满通灵说”，他认为兽面纹、夔纹、鸟纹都与天有关，云雷地纹则是天的象征，是人与神进行沟通的媒介，人骑上这几种鸟或兽，便能上天与神或祖先交流。除此之外，醴陵狮形山象尊所有动物纹样的眼睛都特别突出，这与商代“目视通神”[10]的观念有关，通过强烈的目光表现增强器物的神圣性。

醴陵狮形山象尊除了作为酒器的使用功能以及沟通祖先神的宗教功能外，它还是贵族阶级权力地位的象征。学者巫鸿在《全球景观中的中国古代艺术》一文中指出，“礼器的更重大的社会意义在于凝聚了巨量的人工劳动和特殊的技术性，它的功能在于显示出对人工和技术的‘浪费’及该器物所有者所拥有的‘浪费’这些人工和技术的权力。因此它可以成为社会地位以及宗教权威的象征物”。青铜器制作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只有贵族阶层才能拥有。醴陵狮形山象尊精湛的工艺和复杂的装饰，已然象征着其所有者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10]。

醴陵狮形山象尊的功能与意义是多元立体的，它既是实用器物，又是宗教器物；既是权力象征，又是艺术杰作。这种多重属性的统一，正是中国青铜文明独特魅力的体现，也反映了古代先民对物质与精神、人与神关系的深刻理解。

5. 结论

湖南醴陵狮形山象尊作为商周青铜文明的杰出代表，具有多重价值。其以全立体圆雕塑造亚洲象形象，不论是复杂多样的装饰纹样，还是多范浑铸工艺展现当时最高技术水平，是“制器尚象”理念的物化体现。这件象尊见证了南北文化交融，一方面既承袭南方动物造型传统与地域工艺，另一方面又吸纳中原典型纹饰，反映了商周长江与黄河流域的文明对话，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研究提供实证。它既是设计巧妙的实用酒器，又是沟通人神的宗教礼器，更象征着所有者的权力地位，凝聚了商周物质与精神文明的精髓。

参考文献

[1] 熊传新. 湖南商周青铜器的发现与研究[M]. 长沙: 岳麓书社出版社, 2007: 410-421.
[2] 段西洋. 论南方象尊[J]. 南方文物, 2021(2): 227-238.
[3] 谭鑫刚. 湖南省博物馆藏青铜象尊解读[J]. 文物天地, 2018(8): 58-62.
[4] 吕不韦. 吕氏春秋新校释[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289.
[5] 傅聚梁. 谈湖南出土的青铜器[J]. 考古与文物, 2001(1): 42-48.
[6] 郑玄. 礼记正义[M]. 孔颖达, 注. 上海: 古籍出版社, 1997: 76.
[7] 晁福林. 论殷代神权[J]. 中国社会科学, 1990(1): 100.
[8] 杨宝成. 殷墟象坑和“殷人服象”的再探讨[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3: 66-72.
[9] 张光直. 中国青铜时代[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3: 313-315.
[10] 巫鸿. 全球景观中的中国美术[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 31-33.